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青年学者文丛】

张立波
著

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 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

YUEDU SHUXIE HE LISHI YISHI
DUI MAKESI DE DUOCHONG BIAOSH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0-0/151

20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

主持人：赵家祥

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

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

YUEDU SHUXIE HE LISHI YISHI

DUI MAKESI DE DUOCHONG BIAOSHU

张立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张立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青年学者文丛)

ISBN 978-7-301-13389-7

I. 阅… II. 张…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3827 号

书 名: 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

著作责任者: 张立波 著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389-7/B·07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4.25 印张 216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导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愈来愈呈现出多重面相:生存论的,生活世界观的,后现代主义的……这多重表述的呈现,无疑和国际学术交往的增多有着直接关系,受到国外马克思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相对于70年代末以来“正本清源”、“恢复本真面目”的努力而言,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发挥和引导。

在《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一书中,我做了三方面的探索:一是马克思在后现代境遇中何以存身,是否可以简单地把他打发掉?二是马克思是否可以打扮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三是马克思何以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不打算把马克思处理成和后现代直接对抗的关系。当然,马克思和后现代也不是简单的血亲关系。有目共睹的是,在后现代境遇中,马克思的多重表述具有合法性、可能性的根基。我很赞赏多重面相的呈现这一蔚为大观的理论景象。在本书中,我希望从语言学和叙事学的角度,为多重表述提供一些学理上的支持。

在阅读马克思的道路上,后来者往往指责先行者有意无意地误读了马克思,曲解了马克思。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第二国际误读了马克思,甚至认为恩格斯也曲解了马克思,继而又指责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起初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有意歪曲,最近二十余年来又不断展开对“斯大林模式”的批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误读和曲解?通常的答案不外乎三种:存心不良;理论水平有限;时代局限。这些答案当然都有一定道理,但说服力非常有限:何以断言“存心不良”?理论水平总是有限的,任何时

代都是有局限的。第一章试图从阅读的方式入手,把思考推向深入。

在1953年的最初著述中,为了有别于萨特的存在概念,巴特使用了书写这一概念。这部著述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书写的零度》,其宗旨是展现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国当代文学史。用书写替换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开始?第二章试图从书写的视角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书写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表明形式革新的重要性不亚于内容的置换。

世界历史、进步和历史的终结是现代思想的重要议题。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对这个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终结论”再次喧嚣一时,特别是福山《历史的终结》引发一系列的争论。第三章从对于马克思的哲学和现代性思想的思考入手,对福山的学说提出批评,对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意义做出解说。

在对于马克思的阐释和发挥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伯恩斯坦到卢卡奇,再到萨特和阿尔都塞,以致拉克劳和墨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流派。从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运用来看,表现出从方法到视域的游移;从其对马克思理论的判断来看,表现出从科学到叙事的游移;从其发挥的现实功能来看,表现出从批判到讥讽的游移。第四章揭示了这些游移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1978年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重要工作就是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原理教科书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研究的视域不断扩展,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催生了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第五章着重探讨了这方面的内容。

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的呈现,不全是文字的或思想的游戏,也不全是争夺话语权和理论制高点的动机使然。泛泛而谈,这是文本和历史的权力所促成的“自然”结果。马克思的思想的多重表述,并不必然导致其生命力的丧失;相反,马克思思想研究内部的商谈,当有助于其活力的不断发挥。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透过这些各不相同乃至相去甚远的表述,与今天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保持实践的关联。

目 录

导 言/1

第一章 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1

- 一、朴素式阅读/9
- 二、征候式阅读/11
- 三、互文式阅读/17

第二章 书写马克思的三种方式/23

- 一、政治性书写/35
- 二、教程性书写/39
- 三、修辞性书写/44

第三章 普遍史、进步和历史的终结/53

- 一、哲学的极限/54
- 二、现代性的反思/58
- 三、并非线性的进步/64
- 四、终结的可能和不可能/70
- 五、后殖民的思索与迷惑/84
 - 1. 从《东方学》到《文化和帝国主义》/84
 - 2. 后殖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91

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踪迹/98

- 一、从方法到视域/99
- 二、从科学到叙事/109

目 录

三、从批判到讥讽/124

1. 主体的弥散/125

2. 资源的迷乱/130

3. 文化的迷思/135

第五章 自由流动的未来/141

一、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嬗变与重构/141

二、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153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153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159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理论/163

三、学科、学说和介入生活的方式/168

1. 作为一门学科/168

2. 作为一种学说/170

3. 作为一种介入生活的方式/173

四、学术性与现实性的游离与耦合/177

五、身体在实践话语中的位置/184

1. 理论资源/185

2. 身体与生产实践/190

3. 身体与消费实践/193

六、性别在唯物史观中的位置/196

七、SARS 话语的符号学分析/202

结束语/206

主要参考文献/213

后记/218

Preface/1

Chapter 1 Three Ways of Reading Karl Marx/1

- 1 Direct Reading/9
- 2 Symptomatic Reading/11
- 3 Intertextual Reading/17

Chapter 2 Three Ways of Writing Karl Marx/23

- 1 Political Writing/35
- 2 Curricular Writing/39
- 3 Rhetorical Writing/44

**chapter 3 Universal History, Progress and the End
of History/53**

- 1 The Utmost of Philosophy/54
- 2 Critical Reflection on Modernity/58
- 3 Non-linear Progress/64
- 4 The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of Endness/70
- 5 Puzzling over and Being Puzzled with Post-colonization/84
 - (1) From *Orientalism* to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84
 - (2) Marxism and Postcolonialism/91

Chapter 4 The Trace of Thought about Western Marxism/98

- 1 From Methodology to Perspective/99
- 2 From Science to Narrative/109
- 3 From Criticism to Irony/124
 - (1) Decentralizing Subjectivity/125
 - (2) Confused Resources/130
 - (3) Cultural Myth/135

Chapter 5 Towards the Free-flowing Future/141

- 1 Evolution and Rebuilding of Philosophy Textbook Style/141
- 2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omparative View/153
 - (1) Chinese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153
 - (2) Western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159
 - (3) Social Theories and Marxist Philosophy/163
- 3 Discipline, Doctrine and the Mode of Intervention to the Life/168
 - (1) As a Kind of Discipline/168
 - (2) As a Sort of Doctrine/170
 - (3) As a Mode of Intervention to the Life/173
- 4 Dissociating and Coupling of the Academic and Reality/177
- 5 The Orientation of Body in Practice Discourse/184
 - (1) Theory Resources/185
 - (2)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Body/190
 - (3) Consumer Practice and Body/193

C
o
n
t
e
n
t
s

6 The Orientation of Gender in Historical Material-
ism/196

7 Semiological Analyzing of SARS Discourse/202

Concluding Remarks/206

Bibliography/213

Postscript/218

第一章

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

在现代语境中,所谓阅读,也就是考察作者、作品以及作者、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现代语境中,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者是自己作品意义的决定者,而作品又决定了读者的理解视域。既然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决定的,要理解一个作品,明智的做法自然就是考察作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社会境遇,以及作者写作的意图、动机和提出的见解。虽然也会谈到读者,但所涉及的只是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而对读者自身功能的研究微乎其微。这样,在既有的作品面前,读者处于一种被动的感知的位置,他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等待影响和教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品(work)开始被置换为文本(text)。依据巴特的观点,“作品是具体的,占用了一部分的书籍空间(例如,在图书馆中),而文本是一个方法论的领域……这种对立让我们回想到拉康在‘现实’和‘真实’之间作出的区分:一个是明摆着的,另一个则是被证明的。”^①随着作品被置换为文本,阅读所关涉的“主体(作者)/客体(作品)”被置换为“实践(写作)/(互文性)领域”。后者貌似二元对立的形式下,没有任何具体的对立。比较而言,作品是一个具体的客体,文本则是一个始终开放的领域中的游戏,并必须在这个领域中得到解释。换言之,作品是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文本则始终处于生成之中。因

^① Roland Barthes, “From work to text”, In Josue Hariri ed.,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74.

此,从文本的渊源、作者的声音或文本的语境来寻求文本的意思和解释,是不可取的。

随着作品被置换为文本,作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考察了作者的谱系,提出我们习惯于说作者是著作的天才创造者,在他那里蕴藏着无比丰富的经验,并拥有一个不可穷尽的意指世界,而事实正好相反:作者不是灌注一部作品意指的无限源泉,作者并不优先于作品;在我们的文化中,作者是人们进行限制、排除和选择的某种有效性原则^①。福柯认为,作者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它表征的是人们惧怕意义膨胀的意识形态形象。现在面对文本,我们不应再追问“谁在真正说话”,而应思考:这些话语以何种形式存在?它曾在哪里使用过?它怎样才能流通?谁能将它据为己有?在它内部什么地方可接纳一个可能的主体?谁能承担主体的这些变化不定的功能?

在福柯看来,19世纪出现了一类可称作“话语的创始人”的作者,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创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马克思就属于这样的“话语的创始人”,他不只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还奠定了话语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具体地说,马克思既使某些类同成为可能,也使某些差别成为可能;不但造成了以后的文本能够采用的相似性因素,也为一些差异打开了闸门,为引进一些异质性因素开辟了空间。因此,不能依据现代的作者概念来理解作为话语创始人的马克思。福柯还提出,一种话语的创始与其后生成的转换是不同构的,扩展一种话语的类型并不是给予它一种在开始时并不具备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潜在的应用道路。在此转换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宣告这些创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题是错误的,所谓的“错误”或者被视为创始人著作中无关紧要的陈述,或者被视为是“史前的”因素。总之,一种话语实践的创始并不参与其以后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话语领域里“返回始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人文科学中的作者之死和社会中的立法者之衰落是并驾齐驱的。

^① 参见福柯:《什么是作者》,载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现代作者在社会中承担的是“立法者”角色,这一角色具有优先接近真理、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特权,对争执不下的各种意见纠纷做出仲裁,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当遵守的。而在后现代语境中,阐释者取代了立法者。阐释者不提出普遍的真理主张,也不提供任何强制性指令,他只是勾画出各种选择,并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参与各种公开的争论;他调停社团内部的争论,并对拥有不同真理观念的其他社团解释和说明这些论述;他时刻提防沟通过程中的意义扭曲,但并不认为其中哪一个解释具有绝对的优越性^①。

随着读者地位的提升,读者批评脱颖而出,它特别强调读者在批评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作为批评的主要内容,着重探索读者与作者、文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而且,相比较此前批评模式致力于真实与虚假的分界,读者批评更多地关注阅读的趣味。读者批评最初仅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弥漫播撒,抛弃作者、重置读者的做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任何一部文本,都是为阅读而写作的,这样,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读者始终是“在场”的。伊瑟尔提出了隐含的读者(implied reader)这一概念。所谓隐含的读者,不是指实际进行阅读的读者,而是文本的一种特殊构造,是文本结构的组成部分,它提示了透视文本意义的若干角度。埃尔文·沃尔夫提出了有意向的读者(intended reader),意在重新建构作者心目中所具有的读者概念。在他看来,常常不是现实读者的趣味,而是在作者想象中构成的读者意念限定了文本的形式和主题思想。普莱提出了虚构的读者(virtual reader)这一读者类型,它一方面是作者对读者构想的外溢,另一方面是阅读指示的楷模,是为真实读者(real reader)提供的标准读者。也许,最重要的是重视真实读者亦即实际阅读文本并做出反应的读者。真实读者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真实读者的处境也是各不相同的。罗兰·巴特区分了四种阅读类型。在第一种阅读类型中,读者把文本描述的世界看做是真实的,并感受一种幻觉,经

^① 参见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常通过认同某个特定人物。热情的青少年读者往往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失去了对周围世界的所有感觉，全身心愉快地融在故事当中，从而失去了一个想象的世界。第二种阅读需要大量的智力活动，或者不断重复某种过程，例如分析和综合，探询所阅读东西的主题，或者不断寻找文本中象征的意义，以及弄懂寓言的意思，这两个过程的目的都要求对所讨论文本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巴特提到的第三种阅读适合于侦探故事，阅读的满足感在于弄明白所有的细节和线索是怎样被放在一起构成故事的主要结构。第四种阅读的愉悦与第二和第三种的完全相反，它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整个文本上，而是放在文本的碎片上，如句子甚至词组。巴特称之为盲目崇拜式的阅读，因为它选出文本的几个小部分并认为它们包含了作品的精华或者作者的世界观^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阅读，旨在从文本中包含的有关作者的生活或时代的信息中获得愉悦。能获得这种愉悦的，似乎主要是那些对特定时期已经有所了解的人。

我们相信，意义并不内在于文本，而是在文本和读者的相互作用亦即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文本制约着读者，读者也可以建构文本，所以，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简单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这种创造性特别体现在读者对空白的发现上。在读者批评看来，即使是追求完整统一的传统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省略、遗漏甚至神秘，读者应有意识地去发现文本中的空白，充分体味文本中那些沉默的因素，分析空白在文本结构和技巧中的作用，用想象和理智去参与文本的创作。在此意义上，空白是阅读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动力，它促使读者不断增补和调整，充分发挥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见解。在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② 马克思还强调：“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

^① 参见史笛文·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① 马克思的这些表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艾柯的话:“为了不致给通往文本的道路制造麻烦,作者最好在他完成写作时立刻死亡。”^②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否颠覆了现代的主体概念^③。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颠覆,那么,发挥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批评理论,就是完全可能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批评理论不会坚持“作者的死亡”,而是在读者、文本、作者和时代之间斡旋。

就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而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塑造了经典的马克思画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读马克思;70年代末以来,国内也开始重读马克思。对马克思的阅读何以成为问题?为什么需要重读马克思?对这些前提性的问题,大家的思考是相当有限的,答案也是相对简单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现本真的马克思上。在这种解读中,读者和马克思文本的关系,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关系:文本静止地待在那里,等候着读者的走近;读者则力图摆脱自己的各种主观愿望,期望原原本本地把握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读者也曾试图发挥主体的作用,那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接受文本发出的各种指令。对于阅读—接受过程本身,则几乎是完全忽视了。也正是由于这种忽视,我们无法在不同的阅读结论之间进行调停和对话。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的作品孤立起来,将它绝对化成一种没有时间的物,绝对化成一种供人观赏的静止不动的纪念碑;而马克思文本的时间性的发挥,有赖于读者的时间性。基于这种认识,在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就需要具体考察马克思的文本的“隐含的读者”、“有意向的读者”或者“虚构的读者”:是工人、资本家,还是自己的同志?是本土的居民,还是外国人?是现时代的人,还是未来的人们?我们也需要思考“真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Eco, *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 Orlando, Fla.: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1983, p.7.

③ 参见张汝伦:《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读者”：在不同时期，现实地阅读马克思文本的读者是哪些人？他们的反应如何？工人、革命者、同盟、敌人各自的反应何以形成？例如，《共产党宣言》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委托而写的，其目的是为了整合组织，因而不难推断，这个文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现实，不能不考虑全体盟员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和各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态度。这种面面俱到的考虑，以及党纲的写法，都限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论证。换言之，这个文本必然有各种缄默不语的地方。事实上，马克思的确采取了各种写作策略，以适应包括编辑在内的“有意向的读者”的旨趣。在恩格斯替马克思为美国的一家报纸撰稿时，马克思特别提醒：“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① 另外还应考虑到，马克思撰写的新闻作品在问世时，可能经过了编辑的加工处理，以合乎他们的要求。所以，只有具体辨识马克思不同文本的“隐含读者”、“有意向的读者”和“具体读者”及其反应，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马克思文本的意义，看待马克思文本在历史流变中的不同效果。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文本的第一读者，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马克思文本的“接受指令”。依据卡弗的考证，马克思似乎没有对自己和恩格斯关系的性质有太多描述，只是在一个新闻记者写到“Marx and Engels says”时，他抱怨说，这把他们两个人视作一个人了^②。另外，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仅仅说“在德国的友人”再三请求他写这本书，而在1885年（——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的序言中，恩格斯提出，这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他还说，在付印之前，他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卡弗追问道：“为什么要读给马克思听？（马克思自己能读！）即使他是大声朗读，马克思在听吗？奇怪的是，恩格斯没有谈到马克思自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页。

② 参见 Terrell Carver, *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5.

对《反杜林论》说了些什么。”^①卡弗认为,虽然马克思 1880 年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写的前言向读者推荐《反杜林论》,但也只是肯定它的“政治”内容,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反杜林论》的认可是有限的。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诸多作品写了导言或序言,在恩格斯的叙述中,马克思成为“年长的合作者”,他则是“年少的合作者”,一旦马克思离开了,共同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恩格斯以“一致同意”和“工作分工”等缘由,确立了自己作为“标准读者”或者说“理想读者”的地位,并绘制出标准的马克思“肖像”。在一些人看来,忠实的后人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幅肖像。恩格斯提供的马克思肖像是唯一合法的肖像吗?如果承认读者是复数而非单数,承认读者不是无时间性的抽象存在,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在恩格斯的解读之外,势必还有其他的合法的阐释和理解。各种不同的阐释之间是否具有或者说可以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如果承认读者和文本之间不是单向的被动接受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即:读者受文本的召唤,按照自己的主观条件去实现文本的潜能,使文本成为他自己的文本;与此同时,他也按照文本规定的范围和方式改造自己,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作单纯的学术作品来读,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歧异,甚至得出截然对立的结论,发挥出不同的理论思路。由此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就不再是认知的“真实性”,而是这样的问题: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读者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的文本又如何影响了读者及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如果把读者大致划分为消费者类型的读者、批评者类型的读者、作者类型的读者^②,那么,我们大致可以说,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培养出的是消费者类型的读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马克

^① Ibid., p. 170.

^② 参见朔贝尔:《文学的历史性是文学史的难题》,载瑞曼等著:《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